

蘇聯與東歐共黨國家的關係

畢英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頓獲良機，實現沙皇俄國的夢想，把勢力伸入東歐與巴爾幹。蘇聯軍事佔領東歐，使它能夠把「人民民主」制度移植過去。結果，東德、波蘭、捷克斯拉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相繼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納入了蘇聯的勢力範圍。

俄人對東歐的野心有其歷史和地理的根源。數世紀以來，東歐是俄國與西歐大國間的緩衝地帶。在過去兩百年內，俄羅斯始終試圖在這一地區建立其唯我獨尊的影響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終於如願以償。這一方面滿足了俄國建立一個安全地帶的歷史的與戰略的需要；同時，也架設了進一步向西歐赤化的跳板，而且還供給蘇聯一個任其掠奪與剝削的地盤。基於這些以及其他原因，維繫其在東歐的控制是最近三十多年來蘇聯東歐政策的基本目標。

蘇共控制東歐的樞紐

儘管國際形勢在不斷演變，蘇聯共黨鞏固東歐勢力範圍並在客觀條件下向外擴張的目的始終未變；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內，採取不同的控制手段與態度而已！史達林的鐵腕手段與老子作風、黑魯雪夫的凡事武斷與老大哥姿態，以及布里茲涅夫的平易近人與兄弟論交等等，部分也許是由於蘇共頭子的性格使然，但是極大部分却是基於客觀的形勢。例如，布里茲涅夫雖然裝出一臉笑容，而當捷克人民爭取自由運動高漲之時，他却使用了史達林很少使用而黑魯雪夫曾用之於匈牙利的暴力手段。因此，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形式可能變化，本質則一貫不變。

在軍事上，蘇聯控制東歐集團的樞紐是華沙公約組織聯合武裝力量，其最高司令部之總司令及參謀長等職一向由蘇聯將領擔任。目前，蘇聯在東歐境內共駐有三十一個師，一萬多輛中型及重型坦克。這些蘇聯武裝部隊分由四個蘇聯集團軍司令部指揮。駐德集團軍駐於東德，轄二十個師；北方集團軍駐波蘭，轄二個師；南方集團軍駐匈牙利，轄四個師；中央集團軍駐捷克，轄五個師①。

註①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東西雙方軍事力量之比較——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見「蘇聯」部分。

。華沙公約聯合武裝部隊的約定目的是：強化東歐之防禦力量「以保衛各國人民之和平勞動、保障其領土之完整、並防禦可能之攻擊」^②。顯然，它原是以對付北大西洋組織的。然而，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軍事干涉捷克內政却也打着華沙公約組織的旗子。由此，可見華沙公約在蘇聯軍事控制東歐的策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經濟上，蘇聯控制東歐的樞紐是經濟互助委員會。一九七一年七月，經互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進一步加深、完善經互會成員國間之社會主義經濟整體化之合作與發展綜合綱領」，蘇共誇稱整體化綱領之實現將使各經互會會員國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國際勞動分工」的優越性，而且將更加堅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統一與合作」^③。按照蘇聯的理想，在經濟整體化的分工原則下，東歐各國的經濟與工業發展將成為蘇聯集團的總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但均無法脫離蘇聯控制而獨立。

在政治與思想上，蘇聯利用東歐各共黨為其主要控制工具。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控制樞紐，因此其方式也頗不單純。本來，蘇聯駐東歐的外交人員、貿易組織、文化團體等皆是蘇聯控制東歐各國的工具。而直接控制各國黨魁又是其控制各國共黨組織的主要方法。

儘管蘇聯用盡心機維持其在東歐的霸權，但是蘇聯在東歐的盟主地位在史達林統治的顛峯時期即已遭到挑戰。在東歐集團存在的三十年中，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反蘇或反共事件，大者計有：東德一九五三年東柏林等城市的工人「暴動」；捷克一九五三年倍爾森（Pilsen）等地的「暴動」及此後一九六八年民主化與獨立自主運動；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革命運動；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一年與蘇聯絕交；波蘭一九五六年工人「暴動」、一九七〇年港口碼頭「麵包暴動」以及一九七六年「物價暴動」；羅馬尼亞一九六四年開始執行獨立政策；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與莫斯科斷交，史達林死後雖然彼此修好，但南國仍保持其獨立路線。

蘇聯在這些事件中所採取的措施為何？這些措施能否達成其預期目標？為了解答這一些以及另一些疑問，本文擬就「史達林與狄托之爭」、「匈牙利起義」、「蘇阿分裂」、「羅馬尼亞獨立路線」及「捷克事件」進行分析。當然，所列五個事件並未概括東歐集團內所發生的全部動亂，但是這些事件比較突出，對三十年來蘇聯及東歐關係的特性具有啟發性的暗示。藉着這些分析，也可了解蘇聯控制東歐歷來所遭遇的重大困難，與東歐附庸如何對付蘇聯的控制。

史達林與狄托之爭

戰後初期，南斯拉夫共產黨徒完全忠於史達林與蘇聯。但是，當蘇聯建議成立兩國聯合股份公司被拒、以及蘇聯軍事顧問堅持南斯拉夫游擊單位應按蘇聯紅軍型態改編遭到反對後，蘇南關係開始不治，至一九四八年二月狄托拒不奉召前往莫斯科，於是蘇共不

註② 「華沙公約」，第五條。

註③ 「真理報」，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

僅指責南斯拉夫共產黨犯了偏差、自大及忘恩負義，而且指控其爲托洛茨基主義者。起初，南斯拉夫共黨持妥協態度，反應溫和，一方面表示忠誠，一方面暗示，蘇共中央委員會所獲有關南斯拉夫的情報不確。他們一再向莫斯科誓言效忠，可是莫斯科堅持要南斯拉夫無條件投降^④。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共產黨情報局」宣佈開除南斯拉夫共黨並公開呼籲南共黨內高級幹部驅逐狄托及其領導集團。此外，史達林復對南斯拉夫施以種種壓力，例如，經濟抵制、軍事調動、惡毒宣傳、演習、邊界事件等，但是未曾出兵侵犯^⑤。狄托爲求自保，遂轉向西方尋求援助。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反應雖然不是驟然而至，但是堅決可靠，終使南斯拉夫渡過危機。

在史達林與狄托的爭執中，史達林利用威脅與壓力試圖使南斯拉夫重新馴服於蘇聯的路線。史達林嚴厲對待狄托的另一個目的在警告其他東歐附庸：共產集團內之任何國家一旦偏離或違背莫斯科的命令，將無法逃避處罰。史達林對南斯拉夫施加壓力，雖然未能達成第一目的，但是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第二個目的，使共產集團內的其他領袖在史達林有生之年未作反史的言論或行動。所以，在史達林死亡之前，莫斯科頒布的指示與命令，東歐各國除南斯拉夫外皆遵照執行。

當時，史達林對付狄托還有另外兩個可選擇的手段，一個是軍事佔領南斯拉夫，一個是妥協。關於第一選擇，史達林也許覺得沒有必要，因爲這一爭執乃是他與狄托個人之間的從屬關係及意識形態差異問題，並不直接影響蘇聯重大的國家利益。此外，蘇聯若要對南國用兵，勢必經過第三國家，無法在達到目標前隱藏其軍事行動，像其對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及對捷克（一九六八年）用兵一樣。同時，蘇聯領袖相信，利用顛覆手段推翻反叛政權是一個更好的手段。在另一方面，那時正值史達林權力在共產集團內達於高峯，對反叛的南斯拉夫共黨政權妥協不僅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而且也會爲其他東歐領袖立下了壞的榜樣。

匈牙利起義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布達佩斯大學學生在匈牙利國家博物館的花園內示威。他們要求恢復國家的獨立。這一運動迅速地展開。蘇聯起初似乎不甚關心，直至十月二十五日，「匈牙利工人黨」第一書記奇諾（Erno Gero）宣佈辭職，布達佩斯城的蘇聯國徽全被取下，史達林像被摧毀，軍隊加入民衆運動，民警向祕密警察開火。在幾天之內，匈牙利幾乎全部獲得解放。起義分子越來越明顯地排斥共產主義。蘇聯官方宣稱，這一事件起源於「帝國主義反動力量」的圖謀，其目的在使匈牙利與「社會主義陣營」分離，把它造成中央歐洲的戰爭溫床。所以，蘇聯駐匈牙利軍隊應「十月二十四日匈牙利政府與黨領袖的請求」，同時根據「華沙

註④ 斯塔爾（Richard F. Starr），「東歐共產政權」（史坦福：胡佛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第二〇九頁。

註⑤ 加辛（Charles Gati），「蘇聯在東歐的指導」，載「當代歷史」，第六十一卷第三六二期第二〇六頁。

公約」，開始協助消滅「暴動」並恢復「正常生活」與生產^⑥。於是，發生了多處爭戰，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非命。匈牙利人民的爭取自由與獨立的希望也在蘇聯的鐵蹄下暫被壓抑。

蘇聯軍事干涉匈牙利係出於一種畏懼的心理，因為這一革命本質上是一個民族的反共與反蘇運動。在事變之初，匈牙利納奇（Imre Nagy）政權即已打破了共產主義體系：採取了解散秘密警察，恢復多黨制，及釋放政治犯等措施。納奇更宣佈匈牙利獨自退出華沙公約，並採取中立主義的對外政策^⑦。匈牙利起義發生在美國總統艾森豪宣佈「解放政策」之後，這一政策至少在口頭上誓言，要使東歐附庸從蘇聯統治下解放出來。同時，「自由歐洲電台」不斷鼓勵東歐人民起來反抗共產政權。這些皆使蘇聯懷疑美國是這一事件的幕後支持者。

面臨匈牙利的革命怒潮，蘇聯領袖有兩個抉擇：放棄匈牙利使其歸於「帝國主義陣容」，或進行軍事鎮壓。為了蘇聯的重大的國家利益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蘇聯採取了後一抉擇。結果，匈牙利雖未轉向「帝國主義」陣營，但黑魯雪夫政權及整個共產運動却遭到極大損害。

蘇阿分裂

在若干方面，蘇聯與阿爾巴尼亞的分裂跟史狄之爭不盡相同；在本質上，也有異於匈牙利起義。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係在南斯拉夫共黨的保護下發展起來的，而且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間，阿爾巴尼亞是南斯拉夫的附庸。史達林曾鼓勵南斯拉夫合併阿爾巴尼亞，後來史狄關係破裂才使阿爾巴尼亞逃掉被兼并的命運。所以，史狄絕交後，阿爾巴尼亞曾對親南斯拉夫的阿共領導人物進行激烈整肅^⑧。因此，一九五五年蘇聯與南斯拉夫改善關係，頓使阿爾巴尼亞領導憂心忡忡，而一九五八年蘇南再度不和與中共對狄托的猛烈攻擊都得到了地拉那的熱烈歡迎。其後，蘇南又逐漸修好，阿爾巴尼亞自然不悅。

在意識形態上，阿共同中共一樣，認為自一九五六年蘇聯共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蘇共一直執行修正主義路線。一九五七年二月，阿共領導人霍查（Enver Hoxha）於「阿爾巴尼亞工人黨」（即阿共）中央委員會上報告了阿共對這些問題的立場，而他在一九六〇年所作的聲明祇是上述報告的擴展。阿共的立場可歸納為四點：第一，霍查堅決反對貶史達林運動。第二，他不願改變阿爾巴尼亞的發展計劃，也就是拒絕蘇共勸使阿共放棄工業化的建議。第三，阿爾巴尼亞絕對不與南斯拉夫調和。第四，阿共認定

註⑥ 「蘇聯大百科全書」（莫斯科，一九五七年），見「匈牙利」條。

註⑦ 阿斯帕吐倫（Vernon V. Aspaturin），「干與捷克之餘波」，載「當代歷史」，第五十五卷、第三二七期（一九六八年），第三〇五頁。

註⑧ 布里辛斯基（Zb. Brzezinski），「蘇聯集團——統一與分裂」第四版（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第三八七頁。

，蘇共未對帝國主義發動應有的激烈鬥爭^⑨。

這些政策上的歧異雖然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〇年業已清楚地形成，但是蘇聯與阿爾巴尼亞之間國與國及黨與黨的關係最後的決裂，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才發生。據阿爾巴尼亞宣稱，黑魯雪夫曾支持一個企圖推翻霍查政權的政變。在此之前，黑魯雪夫亦曾試圖把阿爾巴尼亞拉回蘇聯懷抱，並曾於一九五九年訪問地拉那為恢復蘇阿友好關係作最後努力，但是毫無成就。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M. Shehu）曾對米高揚說，史達林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死得太早；第二，他未曾消滅當今的蘇共全部領導人^⑩。

蘇聯領袖迫使阿爾巴尼亞重返蘇聯陣容的手段係以經濟壓力為主。一九六〇年夏，蘇聯及其大部分東歐附庸終止了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援助^⑪。但由於中共的馳援，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才免於崩潰。黑魯雪夫除了使用經濟壓力外也使用過其他手段；誠如前述阿共所指責，他曾發動政變以推翻霍查的政權並代之以親蘇政權，但是未獲成功。很可能，南斯拉夫曾參與這項政變陰謀^⑫。

蘇聯之所以未進行軍事干預，其原因可能包括：（一）當時阿爾巴尼亞對蘇聯的經濟與軍事價值不大；（二）阿共未曾放棄共產主義體系；（三）蘇阿之間無共同邊界；（四）中共大力支持阿共。一般認為如果沒有中共的大量經濟援助，黑魯雪夫對阿共所施行的策略也許會奏效，因為阿共在重大的經濟壓力下，可能向蘇聯屈服，而不致像南斯拉夫那樣向西方求援。

羅馬尼亞的獨立路線

羅馬尼亞不順從蘇聯，起初是由於經濟顧慮。在東歐集團勞動分工的原則下，蘇聯曾建議羅馬尼亞放棄工業。羅共領袖認為此一綱領對羅馬尼亞是一項政治的和經濟的威脅；而且很快發覺到，日益嚴重的中蘇爭執可資利用，以實現其有限度獨立自主願望。在一九六二年至六三年間，羅馬尼亞開始採取不同於蘇聯集團其他國家的政策，而且這種反抗行動，頗為成功。東歐其他國家的領袖對黑魯雪夫的整體化設計原也心存疑慮，但是祇有羅馬尼亞的立場才使黑魯雪夫於一九六三年七月放棄這個計劃^⑬。

當一九六四年中蘇共分裂擴大之時，黑魯雪夫迫使羅共領袖喬治烏——德治（Gheorghiu-Dej）偏向蘇共，羅共堅決不從。同年四月二十六日，羅共中央委員會公佈一項被稱為羅馬尼亞「獨立宣言」的決議案，其中，宣佈各國擁有「意識形態主權」，并稱沒有一個黨能够替他黨決定，什麼是正確的與什麼是不正確的。

註⑨ 巴諾（Nicholas C. Pano），「阿爾巴尼亞的文化革命」，載「共產主義問題」（一九七四年），八——九月號第四十七頁。

註⑩ 史第爾（J. Steele）編輯，「史達林之後的東歐」（紐約：克倫·羅森公司，一九七四年），第二〇二頁。

註⑪ 格里非塞（William E. Griffith），「阿爾巴尼亞與中蘇關係」（劍橋：MIT印刷所，一九六三年），第四十六頁。

註⑫ 同前註，第四十七頁。

註⑬ 史第爾，第一二四頁。

其後，羅馬尼亞的偏離擴張及對外政策方面。例如，一九六七年羅馬尼亞承認西德；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建交；與美國簽訂各種協定；當東歐各國與以色列斷交時，羅馬尼亞沒有附和。

這些事實使莫斯科與布加勒斯特間的關係更加緊張，蘇共因此對羅共加大壓力，冀其收斂。同時蘇聯進行軍事干預的威脅，始終存在，這種威脅不僅針對羅馬尼亞，而且針對所有東歐國家^⑭。莫斯科對布加勒斯特所施之壓力雖然未曾使羅馬尼亞轉為溫順，確也使其獨立政策不致行之過急與過遠。一九七〇年三月，羅共對外關係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似乎可為蘇共所容忍；拖延了三年的蘇羅友好條約終於在同年七月間簽訂。

可以清楚地看出，蘇聯在處理其與羅馬尼亞的歧見時，頗富容忍與耐心，既未動武，也未公開批評。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羅馬尼亞在國內政策上並未向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挑戰；沒有試圖修改或放鬆共產主義而使其「人性化」；因此對蘇聯或社會秩序的正統與穩定性未構成任何威脅。此外，羅馬尼亞四鄰皆為共產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直接地理連繫，這使蘇聯覺得羅馬尼亞在其掌握之中隨時可加以制裁。而且羅馬尼亞的獨立政策並不損害東歐其他共產國家的利益，所以羅馬尼亞偏離莫斯科的獨立態度也贏得了大多數華沙公約國家的同情^⑮。

捷克事件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晚，當捷克共產黨主席團舉行常會之時，來自蘇聯、東德、波蘭、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的軍隊，祕密地應「捷克黨與政府領袖之邀」越過了邊界，佔領了捷克。這些國家都是捷克的華沙公約盟邦。在前幾年內，捷克共黨領導容許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一九六八年元月，捷共領導集團以杜布察克（Alexander Dubcek）代替諾沃特尼（Novotny）出任捷共第一書記；放鬆了對報刊的控制；允許青年們在公共集會中，自由發表意見；恢復了共產以前的民族英雄的名譽。四月更通過了「行動綱領」，容許各階層人士的言論自由。新擬訂的黨章准許在報刊上進行辯論的充份自由；而且當時有跡象顯示，布拉格將與波昂改善關係。

七月十四——十五日，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對捷克政情担心益甚，因而致函捷克要求禁止其境內的一切非共黨的政治團體、嚴厲控制報刊及無線電廣播、禁止歧異分子公開活動、強化捷克軍隊。捷克對這些要求一口回絕。華沙公約國家，除羅馬尼亞外，乃以武力干涉捷克內政。

與一九五六年蘇聯武裝干涉匈牙利相比，捷克事件的背景，更為複雜。捷克國內政治情勢的演變發生在羅馬尼亞獨立路線之後

註⑭ 阿斯帕吐倫，第三〇六頁。

註⑮ 同前註。

，蘇聯深恐此種連鎖性的反應累增擴大，因而不免感覺到事態嚴重。捷克是唯一一介乎西德與俄國之間的東歐國家，也是唯一與兩個非共產西方國家為鄰的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因此，在地理上，捷克最暴露於西方之前；而在政治傳統、歷史淵源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除了東德，捷克比其他東歐國家更接近西方^⑥。此外，捷克的自由化運動直接向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一些基本原則挑戰。雖然如此，這種情勢倘能局限於捷克境內，蘇聯也未必急着進行軍事干預。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杜布察克及其改革主義的伙伴既不能够，也不一定願意控制捷克境內的政治運動；更不能夠阻止自由化運動向其他東歐國家蔓延。

在一九六八年軍事侵犯捷克事件中，蘇聯領導顯然把蘇聯的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不過軍事侵捷也付出了重大的代價，使蘇共作為世界共產運動領袖的角色以及華沙公約組織遭到了難以醫治的損傷。更糟的是，為了辯護此一侵略行為，蘇共拋出了所謂「有限主權論」，這一理論在世界各地共產黨徒中受到了惡評。縱然如此，由於侵略捷克的結果，蘇聯終能使捷克歸附於蘇聯集團，在短期內維繫了東歐集團的完整，維護了其在西方邊界的圍牆，易言之，蘇聯仍可把坦克部署於西德的邊界附近^⑦。

捷克事件後的蘇聯東歐關係

在蘇聯對東歐附庸各國（不包含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的關係中，一九六八年的軍事干涉捷克事件含有重大意義，它結束了布里茲涅夫政權對東歐的寬容態度。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是由黑魯雪夫到布里茲涅夫政權的過渡時期，在此一時期，蘇聯對東歐附庸的獨立政策傾向有較大的容忍。在這一時期內，東歐附庸雖然口頭上誓言與蘇聯團結一致，實際上却試行其獨立政策：反對蘇聯嚴格控制、實行經濟改革、模仿南斯拉夫式的「社會主義」。一九六八年春天以後，捷克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使蘇聯覺得必須以武力予以制止，否則蘇聯將無法控制東歐附庸各國日益強烈的自治與獨立願望。自然，蘇聯在動武之前，也曾考慮到軍事干涉的後果：西方的抗議，西歐共黨及中共的譴責。但是，如果蘇聯不如此做，就等於完全容許在東歐集團內存在「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後果則是：蘇聯在這一重要地區內的權威與影響力逐漸下降乃至消失。在權衡利害之後，蘇聯終於對捷克用兵，一方面維持捷克的親蘇共產政權，一方面制止東歐附庸的自主傾向。

總結捷克教訓之後，蘇共確立了一個原則，西方稱之為「布里茲涅夫主義」，也就是「有限主義論」。關於這一理論，柯瓦列夫（Sergei Kovalev）在「真理報」上寫道：

註⑥ 同前註，第二〇七頁。

註⑦ 特瑞斯克（Jan F. Triska），「捷克斯拉伐克」，載彼德·托馬編之「東歐共產主義面目的改變」（阿里桑那，士桑：阿里桑大學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第一八九頁。

「毫無疑問，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與共產黨有且必須有決定其國家的發展道路的自由。但是，他們決定不可以損及本國的社會主義、也不可損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與世界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也就是，每一個共產黨不僅對自己人民負責，也要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與整個共產主義運動負責……個別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不能用以反對世界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運動的利益^⑮。」

其實這種有限主權的概念，並不新奇，它在蘇聯的東歐政策中早已存在。然而蘇聯政府毫不含糊地宣佈這一主義却顯示出，布里茲涅夫的政權業已穩固，而且有信心和決心整頓東歐集團。隨着捷克事件的結束與布里茲涅夫主義的出現，東歐附庸探尋自主的「黃金時代」已暫告一段落。從某一角度看，蘇聯係將其在這一地區的利益、安全及意識形態的考慮，置於其他國際政治考慮之上。

就總的形勢看，一九六八年以後，蘇聯與東歐的關係無特殊變化。阿爾巴尼亞不為蘇聯的利誘威逼所屈，仍堅持其反蘇修路線；即使在一九七七年與中共公開辯論「三個世界理論」後，仍無轉向蘇聯的跡象。南斯拉夫與蘇聯祇保持國與國的關係，沒有黨與黨的關係；而在國與國的關係中，亦經常發生緊張情勢，例如南斯拉夫曾懷疑在其境內所發生的「共產黨情報局分子」陰謀活動，係由蘇聯在幕後操縱，經蘇聯及其附庸間接否認後始感釋然。在一九七六年歐洲共黨會議之後，南共支持「歐共主義」，又使蘇南關係蒙上陰影，其後布里茲涅夫訪南，兩國關係稍獲改善。但在另一方面，蘇聯與南斯拉夫間的經濟關係尚不壞。

在羅馬尼亞與蘇聯之間，雖然仍存在着歧見，但是羅馬尼亞，甚至蘇聯自己皆小心翼翼避免公開衝突。羅馬尼亞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堅守立場，但在一些次要問題上採取彈性政策。因此，近年來，羅蘇關係已獲改善，雖然羅共仍堅持，每一共黨有追求自己政策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保加利亞始終是蘇聯在東歐集團內最忠實的追隨者，誠如其外交部長說，「保加利亞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是加強同蘇聯的聯盟」^⑯。在經濟上，蘇聯是保加利亞的主要對手，保國三分之二的進口來自蘇聯，其農產品也部分輸往蘇聯。經濟上的依賴性加強了，其對蘇聯的政治上的馴服性。

當今捷克領導對蘇聯表現得很恭順。在對蘇聯關係上，認同蘇聯最忠實附庸保加利亞的觀點；在國際問題上，尤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對中共政策上，皆小心地追隨蘇聯的路線。對歐共主義、捷共與東德、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同聲譴責。近年來，東德領袖們經常強調與「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整體化，其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問題的解決皆以莫斯科的指示或「建議」為依歸。在一九七四年九月通過的憲法增補中，特別註明：「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國（即東德）與蘇聯永遠地與不可變更地結為盟邦」^⑰。匈牙利無

註⑮ 「真理報」，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註⑯ 「工人事務報」，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

註⑰ 東德現行「憲法」，第六條，第二段。

論在國際問題、國內政治以及共黨關係上，皆忠實地跟隨蘇聯。一九七七年，曾一度同情西班牙等國之歐共主義，但不久改變態度予以攻擊。波蘭與蘇聯之間，誠如一九七四年雙方外長的聯合公報所說，「意見完全一致」；因此無論在集團內或在國際間，波共皆支持蘇聯的政策。

結語

總而言之，「和解」、「東進政策」、「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洲相互裁軍」或「東西貿易」等，是否在實質上動搖了蘇聯在東歐的地位及其程度如何？是一個相當複雜難以肯定作答的問題。不過有一點非常清楚，儘管大部分東歐國家仍舊順從蘇聯，但戰後蘇聯在東歐所享有的堅如磐石的「團結」，現已不復存在。

近年來，國際上流行一個名詞，那就是「芬蘭化」。芬蘭是鄰近蘇聯西北境的一個小國，是一個實施自由經濟、民主政治與社會福利的國家，但在蘇聯的影響與壓力之下，唯有本着「以小事大」的精神，委屈求全，并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緊緊追隨蘇聯。從東歐人民的現實政治看，「芬蘭化」正是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在東歐附庸集團中，各種政治運動的共同方向就是爭取獨立——不完全依附蘇聯，獲得較多的經濟、政治與軍事獨立。但東歐各國領袖與人民懷於捷克事件的教訓，也深知爭取獨立之舉，不可操之過急，以免觸怒蘇聯，而重蹈捷克的覆轍。

以埃和談的評估與展望

石 樂 三

美國助理國務卿艾瑟頓 (Alfred Atherton)，曾於一月間隨同范錫國務卿出席在耶路撒冷召開的以埃政治會議，會議破裂之後，他繼續留在中東，穿梭於耶路撒冷與開羅之間斡旋和平，前後經三十天的努力，仍未能恢復該項會議。現在華府為謀求達成一項和平原則宣言的協議，俾便早日恢復以埃和談，特別組成一和平調解小組，並指定艾瑟頓為首席代表。彼已再度前往中東致力於調停任務；同時比金總理應邀於四月底訪美與卡特會談。中東和平又出現新轉機。

一 以埃和談經緯

埃及總統沙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比金，曾於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在伊斯邁利亞 (Ismalia) 舉行會談，同意在耶路撒冷及開羅兩地